

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何方?

■ 麦 笛

目前流传脑洞大开的说法,恐怕都混淆了三星堆的时空背景,产生了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。

时隔三十余载,聚光灯再度照在了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。

2020年9月,三星堆祭祀坑重启发掘,使它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。与此同时,过去关于三星堆的种种猜想,也在网络上不断发酵。

或以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是天外来客,或以为三星堆文化便是夏文化,或以为三星堆先民是古埃及或苏美尔的移民。

之所以有这么多脑洞大开的说法,主要原因恐怕是新闻传播混淆了三星堆遗址的时空背景,制造出一种三星堆文化异常先进的错觉,才让民间强行想象各种离奇的解释。

其实,只要澄清三星堆文物的年代,很多关公战秦琼式的想象皆会消散。

三星堆新发现的意义

最近三星堆大热,既与三星堆本身的神秘色彩有关,也与传媒深度介入有关。媒体的造势,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——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。

新发现的鸟形金箔饰、完整的青铜方尊、丝绸遗痕等,则是前所未见

的。丝绸遗痕的发现很重要,但它并非中国最早的丝绸实物。此前在河南荥阳和浙江钱山漾均发现有距今四五千年的丝绸,要早于三星堆的丝绸遗迹1000多年。由于发掘尚未结束,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。

从目前的发现看,新发掘的6个祭祀坑所出土的大量新文物,必将丰富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。更为重要的是,8个祭祀坑将最终为我们呈现埋藏物的整体面貌,并非过去两个祭祀坑的局部材料所能比拟。

不过,新发现总体来说并未溢出已有的认知范围,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三星堆遗址性质、时代、内涵的认识,并未受到大的影响。

三星堆所处的时代

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,新发掘的4号祭祀坑距今3200—3000年,这意味着,4号祭祀坑的年代在商代晚期。该数据也与过去学界对1号、2号祭祀坑的时代定位相一致。学者们在讨论三星堆的祭祀坑与青铜器时,从来都是将它们置于商代的时间框架之中的。

但有人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夏代,因此认为三星堆的文化发展程度要超过中原,甚至认为官方刻意隐瞒或推迟三星堆遗址的时代。主张三星堆先民来自西亚的人,也同样试图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提前。

他们都很可能是受到一种常见的表述——“三星堆遗址是距今4800年至31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”的误导,把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混为一谈了。

狭义的三星堆文化,指的是三星堆遗址三、四期的文化遗存,大概延续了400年,基本可对应中原的商代。出土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,便属于三星堆文化。

具体而言,目前所知的几个祭祀坑属于三星堆文化的末期,相当于商代的晚期。我们不能将祭祀坑出土的遗物追溯到更早的宝墩文化或鱼凫村文化,以至于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二里头、殷墟的还要早。

此外,祭祀坑的遗物还可以同其

他考古学文化的遗物相比照。如尊、罍等青铜器,可与殷墟以及长江中游的同类器形相比较,由此可判定这些铜器的大致年代。过去受限于测年技术,所测得的绝对年代偏早,关于1号、2号祭祀坑的具体年代一度存在争议,但从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为这两个祭祀坑可以早于商代中期,这便主要是基于对器物形制的认识。

三星堆文化的来龙与去脉

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?发展程度究竟多高?最终归宿又是怎样?

这需要放在整个东亚的时空背景下予以认识。

成都平原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化遗存,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—4800年的桂圆桥文化。相对来说,成都平原的开发起步较迟;在同时期的黄河流域、长江中下游以及辽河流域,许多区域业已经过三四千年的发展。距今5300年,正是“长江尾”的良渚文化崛起之际,而“长江头”的桂圆桥文化则显得黯淡得多。

种种迹象表明,桂圆桥文化是甘肃、青海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经岷江上游南下的结果。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线索看,操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民族(包括彝族、纳西族等),其祖先正是沿“藏彝走廊”南下的。

青铜冶炼技术是从西亚、中亚逐步进入东亚地区的,先是黄河上游,继而是黄河中游,青铜冶炼技术在东亚地区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,突出体现在块范法的运用。三星堆的青铜器更在其后,目前所知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不早于商代中期,且其青铜冶炼技术和铜料都是东亚本土的产物,而不是从域外直接输入。

有些人误解了三星堆青铜器的时代,认为三星堆的青铜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,不免本末倒置。三星堆的青铜器的确独具特色,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同时期一骑绝尘乃至碾压中原地区的文化。

可见,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土的宝墩文化、鱼凫村文化的基础上,受到二里头文化、石家河文化等外界文化的刺激而形成的一种全新文化。它既不

是天外来客,也不是古埃及、苏美尔人万里迢迢来拓殖的结果。

至于三星堆文化的去向,同样没有那么神秘。

埋藏有大量精美文物的祭祀坑,学者多认为是一场盛大燎祭的产物。或许是为了配合政治中心的转移和神庙的搬迁,神庙里的神像以及铜器、玉器等重器被有计划地焚烧、瘞埋,同时也沉埋了无数的谜团。

燎祭完成之后,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从广汉的三星堆转移至成都的金沙。三星堆衰落的时间,正是金沙崛起的时间,二者恰好前后相继。而且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青铜立人、黄金面具、玉牙璋、玉琮等器物,简直是三星堆祭祀坑的翻版,二者显然存在承继关系。

三星堆文化的多元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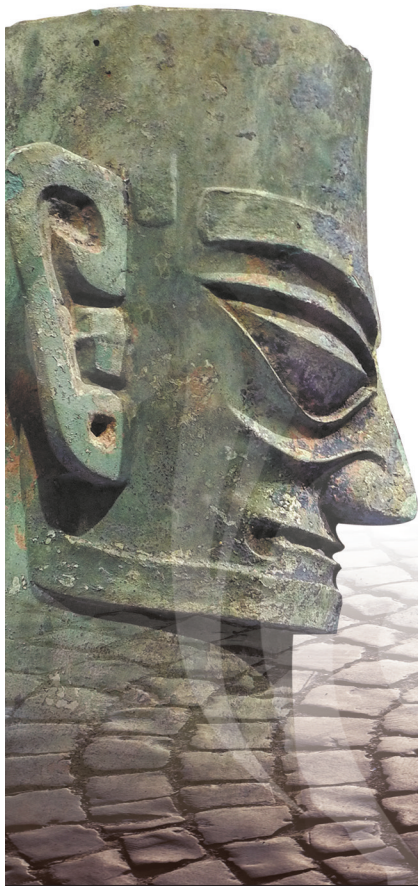
无可否认,三星堆的器物与传统的商周器物反差很大。

从二里头到殷墟到西周,青铜器以容器为主,其性质为祭祀祖先的礼器,而绝少以青铜表现神祇的形象。三星堆则不同,夸张的青铜面具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,与中原传统异趣。

最受世人关注的莫过于来自域外的影响。三星堆遗址地处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“半月形地带”的边缘,同时也位于人类学意义上的“藏彝走廊”,往北连接西北,向南沟通南亚和东南亚,出现域外的文化因素并不足为奇。尤其是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,明显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,如冯原文化出土有类似于三星堆文化的玉牙璋、玉璧、玉戈、玉琮、铜琮、陶豆等器物,可见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存在密切的互动。

中国学术界从未讳言三星堆文化与域外的联系,相反,几代学者都在努力追寻三星堆中疑似域外因素的来源,相关论述连篇累牍。所谓官方有意隐瞒真相的阴谋论,并不能成立。

总之,三星堆文化的面貌是多元的,既有土著文化的持续发展,也受到中原、长江中游、长江下游乃至域外的影响;既继承了悠久的玉文化传统,也吸收了青铜、黄金的新技术。三星堆遗址的多元性,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缩影。



菏泽考古现场发现东周陶兽

连日来,有关“菏泽发现连片汉墓”话题的热度居高不下。根据最新数据,目前菏泽魏楼水库考古现场发现的墓葬总数已超过200座,并出土了两件东周时期的陶兽。两件陶兽造型奇特,实属罕见,其憨态可掬的形象,“萌化”了众多网友。

2020年4月份,在菏泽魏楼水库建设过程中,考古人员发现了孙大园堎堆、侯庄堎堆、侯庄西遗址3处古代文化遗址,并在孙大园堎堆发现了连片

汉墓。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,现场的考古人员惊喜不断。

根据最新数据,目前魏楼水库考古发掘现场墓葬总数增至207座,其中连片汉墓187座,东周墓葬11座,明清墓葬9座。此外还发现灰坑203个,水井6座,房址6座,灶3个,窑1个。此次发掘对堎堆遗址的堆积特点、文化面貌、聚落布局及古代环境地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史料。

其中,连片墓葬群出土的两件东周

时期的陶兽成为关注的焦点。第一件陶兽头部长有两角,嘴巴扁平且微张,腹生有双翅,四脚蹬地,整个身体呈椭圆形。第二只陶兽如鸟类形象,头部仰天,生有双翅和长长的尾巴,两脚站立,作飞天状。

据悉,两件陶兽距今已有2000余年,造型独特,比较罕见,其憨态可掬的照片一经在网上公布,立刻“俘获”了广大网友的心,成为其忠诚“活粉”,争先恐后为它俩取名。(本报综合)

